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两宋文化与诗词 发展论略



刘乃昌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两宋文化与诗词 发展论略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刘乃昌著. —2 版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4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ISBN 978-7-5607-3114-8

I. 两...

II. 刘...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21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1.5 印张 168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200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言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清人蒋士铨的这两联《辩诗》诗，称扬宋诗的成就可与唐诗媲美，这使我们联想到两宋文化和文学创作可与唐代比肩称胜。

宋承唐后是中华文化取得辉煌发展的又一历史时代。宋代文化的隆盛有多种表现：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提倡通经致用，讲求义理，破旧出新，开启了哲学发展的新格局。科学方面，诸如火药的应用，指南针的发明，印刷术的发展，天文学和医药学的演进，可以说成果累累，引人注目。史学方面，朝廷正式建立修史制度，官方和私人都重视编纂史书，如欧阳修、宋祁、范镇等曾受命纂成《新唐书》，陆游自撰《南唐书》，司马光领衔编著中国第一部通史《资治通鉴》，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古代最早的珍贵的专业史籍。宋代在承传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独具风神的“宋型文化”，可以说是亮丽多姿、彪炳史册的。

在宋代宏阔璀璨的文化廊苑中，各体文学的发展和成就占有突出的地位，尤其诗词方面，其创作实绩是前所罕见的。宋诗在中华诗史上与唐诗堪称双峰并峙，各有千秋，它在承传唐诗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形成了可与唐诗抗衡比肩的独立营垒。宋代是诗歌创作数量空前丰盛的时代。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七十二巨册，所收作者将近九千人，作品约为《全唐诗》的四倍。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这

尚不是他作品的全部。宋诗反映社会的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的力度也有所深化,可谓笔锋精锐,人间万象无不可剪裁入诗。宋与唐时代气象和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宋诗表现出迥异于唐诗的独特风神,形成“宋调”与“唐音”的殊异。宋诗在三百多年的演进中,出现了不少创作群体,他们标示创作主张,各立门户,争强竞胜,异彩纷呈,形成不同时期的多种流派。

宋词是两宋文学的辉煌代表,被称为一代文学之最,前人有“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之说。词体兴于唐,唐五代只是词的发轫期、成长期,到两宋方始臻于成熟鼎盛,并取得与诗歌平起平坐而为后世无可企及的地位。词是诗乐结合的文学体裁,在两宋流播广远,风行于社会各个阶层,拥有广泛的创作队伍。宋代词作,据《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宋词数量远不逮宋诗,但作为新兴的“别是一家”的合乐诗体,自有不同于宋诗的独特风神和气韵。词协律可歌,既可传诵于文士书案,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它的娱乐性与传播力,使之拥有众多的接受群体。词体句型错落参差、修短有度,较之齐言诗屈伸自如、收纵多变,且便于吸收生活俚语,模拟常人声口,表现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抒写微妙曲折的内心世界。词兴起时多流行于歌楼酒馆,描写男女之情较为开放,表现视野的幅度稍逊于诗歌,而宣发性情的沉潜度有所深化。词至两宋,小令、中调、慢声诸体大备,写作技艺日趋成熟,风调上群芳争艳,在发展中由婉约而派生宏放,既柔媚又兼劲拔,愈来愈呈现出刚柔互补、浓淡辉映的态势。词在宋代三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演进而臻于极境。

由此了解宋型文化、研读两宋诗词,是领略高雅的文学作品、弘扬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拙稿就宋型文化略予说明,对宋诗、宋词简要地给予评述和鉴赏。全书分列三章:一曰宋代文化亮点述略;二曰宋诗成就简论;三曰宋词发展论略。虽乏独得识见,毕竟昭示了宋代文化文学之风貌与特质。此稿有幸荣膺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得以顺利梓行,有缘借以赢取读者和方家赐教,在此恭致谢忱。

刘乃昌
2005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宋代文化亮点述略	(1)
一、宋代文化的隆盛	(2)
二、宋型文化的特点	(5)
三、宋代文化的神髓	(8)
四、士林风范在文学上的体现	(16)
第二章 宋诗成就简论	(25)
一、宋诗的成就与地位	(25)
二、宋诗的文化背景	(33)
三、宋诗的特色与风韵	(36)
四、宋诗诸体与流派	(61)
五、宋诗的分期	(106)
六、宋诗评价的分歧与研究现状	(110)
第三章 宋词发展论略	(118)
一、词的兴起与繁衍	(118)
二、宋词的鼎盛	(119)
三、宋词的发展轨迹	(121)
四、宋词的流派论	(167)
五、宋人评词的议论	(169)
六、近年来的词学研究	(174)

第一章 宋代文化亮点述略

历史悠久又极具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常常被人们以“汉”、“唐”代称。这大约因为汉唐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重要里程碑。宋承唐后，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所以在文化发展史上人们往往将唐宋并称。的确，宋代在承传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独具风神的“宋型文化”，足与唐代文化并肩屹立，两者各具千秋，同样以光灿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册，驰誉寰宇。

对宋代文化的价值，历代学人每有称述。南宋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①叶适亦云：“近世文学，视古为最盛。”^②明代方孝孺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③清蒋士铨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④近代学者陈寅恪则于《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足见宋型文化作为华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峰峦是大家公认的。

① 朱熹：《楚辞后语》卷六。

② 叶适：《水心文集·播芳集序》。

③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四《谈诗》其二。

④ 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一三《辩诗》。

一、宋代文化的隆盛

宋代文化的隆盛有多种表现。概略言之,哲学突破了五代以来的沉默局面,提倡通经致用,勇于疑古、议论、整合、出新,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形成了以张载、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理学家中又分化出高谈性命的醇儒派和讲究事功的务实派。各家互相辩难争论,思维活跃,构建了新的儒学体系,编著了大量经学著作,开启了哲学发展的新格局。

科学技术方面,宋代也有出色的成就。北宋王朝在开封设置国防工场,专门制作武器,其后编写《武经总要》,记述火药配方,说明火药开始广泛运用。宋仁宗时代,已有关于指南针的记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更有详细的说明。南宋朱继芳《静佳乙稿》有“浮针定四维”的诗句,所咏就是海上航行需靠指南针测定方向之事。宋代印刷术发展很快,印制图书在唐代雕版技术的基础上,由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对传播文化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的天象观测、星图绘制和天文仪器都有所创新,北宋苏颂、韩公廉等人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古代早已驰誉海外,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这方面代表性的论著。宋代医学家重视对医疗方剂的搜集整理,如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贾黄中等编纂的《神医普救方》,采录十分丰富。中草药书籍的编辑出版,在宋代也成绩斐然,如《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以年号取名,说明本草图书各时期层出不穷。另有《图经本草》,配有绘图,图文并茂;《本草衍义》,解析药性,考订精细。凡此种种,足以证明科学技术在宋代有了长足发展。

在宋代宏阔璀璨的文化廊苑中,各体文学的发展和成就占有突出的地位,特别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精神。两宋文学著述超越前代。《宋史·艺文志序》说,当年“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这是符合实际的。以下分别就宋文、宋诗、宋词三个领域略予缕述。

宋文从总体上说创作实绩是前所未有的。陆游提到宋文时曾说:“抗

汉唐而出其上。”^①明人宋濂《太史苏平仲文集序》谓：“自秦汉以来，文莫盛于宋。”宋文有别集流传者约六百余家，包括流传散篇的作者合而计之将逾万人，其中名家如林，流派竞辉，蜚声文坛的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宋初由柳开、王禹偁等承传唐代韩愈、柳宗元宗经明道、重散反骈的旨趣，首倡文风复古，启开一代文风。继而欧阳修主盟文坛，曾巩、王安石、三苏相继崛起，古文运动形成高潮。他们不仅创作了许多广布士林的名篇，确立了平易自然、婉转爽畅、叙议结合、骈散兼容的文章风格，而且倡扬了明道致用、体情见性、表里相济、华实相副的创作宗旨，使当时“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②，扫除了“太学体”的险怪奇涩之风，促进了宋文的健康发展。继北宋古文改革大潮之后，以讲学传道授徒为能事的理学家也有不少散文能手。他们有的虽在理论上宣扬“文能害道”，实践中却也表现出相当的散文写作功力，周敦颐、朱熹等可为代表。他们写有讲学语录，行文质朴自然，言简意精，于记叙文、议论文之外亦可另备一体。南渡前后及宋室末叶，时代风云造就出一批以抗敌卫国为己任的志士，诸如李纲、陈亮、叶适、谢枋得等，写出一些忠义激愤的爱国文章。这些事功派人士，强调“文以气为主”，正如李纲《道乡邹公文集序》所云：“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胸襟流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类作品自然是文章宝库中光芒四射的珍品，是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

宋诗在中华诗歌史上可以说与唐诗双峰并峙，各有千秋。往昔有的学者把唐诗视为古典诗歌不可企及的终结点，从而贬抑宋诗的成就，由此引起了延续颇久的唐宋诗之争。在我们今天看来，唐诗、宋诗各有独诣，是不宜任意轩轻的。宋代是诗歌创作数量空前丰盛的时代。今存宋诗约为唐诗的四倍，反映社会的广度和切入生活的力度都有所展延。宋与唐时代气象和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宋诗表现出迥异于“唐音”的“宋调”。严羽《沧浪诗话》即已提出“本朝体”，朱熹《朱子语类》也有“今人诗”的说法。宋诗在三百多年的演进中，出现了不少创作群体。他们各有主张，争

① 《陆放翁全集》卷四一《尤延之尚书哀辞》。

②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强竞胜。宋初诗坛主要是宗法唐人，方回《送罗寿可诗序》说：“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学白居易，诗风平易晓畅，作者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晚唐体学贾岛、姚合，以清逸幽隐为归，林逋、魏野等人可为代表；西昆体标榜学习李商隐，以杨亿、刘筠为领袖。杨、刘以藻丽的诗风咏唱华贵生活引发诗界不满，加之仁宗时代政治改革声浪高扬，促起了诗歌的矫弊创新。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自觉倡导诗风改革，冲洗浮艳积习，“开宋诗一代之面目”^①。及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登上诗坛，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随后出现了江西诗派，宋调臻于成熟，创作出现高潮。北宋末叶，江西派风行，反映视角内转，其末流削弱了改革诗派所强调的社会政治意识，流弊日显。南渡以后，时代巨变，国运沦胥，推动了诗风演化。吕本中、陈与义等咏出不少离乱之歌，随后出现了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大家。陆游更是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南宋后期抗敌复国的氛围趋于低沉，活跃于此时的四灵诗派和江湖诗派，或敛情约性，因狭出奇，或自喟身世，趋于隐沦，总体上境界狭小，气体纤弱，表现出一种衰世气象。及至元蒙大军压境，赵宋覆灭前后，出现了一批身历家国巨变而矢志不屈的爱国作者，如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人。这些逸民诗人发自肺腑的血泪文字，贯注着报国激情、思国忧愤，堪称是宋代精英高风亮节的展现，同时“亦宋亡之诗史”也。

宋词是两宋文学的出色代表，根据前人代有所盛之说，谓“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②。词体兴于唐五代，鼎盛于两宋。据《全宋词》、《全宋词补辑》所录，宋代词人有一千四百余家，词章有两万四百多首。词在宋代流播广远，多彩纷呈。宋初词坛在承传晚唐五代的基础上酝酿新变，晏殊、欧阳修为开山初祖，两人艺术上师承冯延巳而各有独诣，晏词和婉雍容中时蕴哲思，欧词闲雅舒隽中偶露旷放。成名稍晚的柳永、张先专长曲子词，柳永长于铺叙，发展慢声，多反映市民情趣，把词由台阁引向市井；张先出语精巧，清妙绝俗，韵味隽永，提高了词章的风雅品位。北宋中叶，词的

① 参见叶燮《原诗》，见王夫之等《清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605页。

② 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引沈宠绥《弦索辨讹》。

创作呈现两种走向：晏几道、秦少游展衍婉丽风韵而加以提高，小晏在描写艳遇离合中渗入华屋山丘之感，少游将俯仰身世之感打并入丽思艳情。另一批作者则在突破婉媚格局、开拓词体堂庑上阔步前进，如王安石、李冠赋词怀古，慷慨激越；贺铸以豪侠气宇步入词林，笔势飞舞，格调悲壮。特别是苏轼，以逸怀浩气举首高歌，倾荡磊落，超拔尘垢，在词坛上别立一宗，苏门弟子追踪唱酬，词风为之一变。北宋末叶朝廷设立大晟乐府，大晟词人的应制之作，内容失于空疏；而此时雅善度曲的周邦彦，以赋为词，集婉约词艺之大成；身经家国患难的李清照，咏唱闺情，感伤事变，卓然成为闺秀高手、词林名家。南渡之初，抗金将领和朝臣李纲、赵鼎、胡铨、岳飞等，写出一批慷慨悲壮的时事词；漂流江南的文士叶梦得、朱敦儒、吕本中、陈与义、张元幹等，于传统题材之外也发出抗战复国的豪吟，这都为其后爱国词派的崛起开了先路。南宋中叶朝廷忍辱求和，志士无地用武，词坛出现了两大创作群体：以辛弃疾为首的豪壮派，延展东坡蹊径，挥写壮词呼吁抗敌复国，写出大批激昂排宕的爱国词章；以姜夔为代表的骚雅词派，承传周邦彦的遗泽而创变，以健笔写柔情，用清刚风调咏江湖隐沦。史达祖、吴文英等承其余绪，运意深远，用笔幽邃，变疏为密，词艺颇为专精。宋亡前后，一些抗敌志士唱出不少浩气凌云的悲壮词章；另一些词人则以凄冷的风致，曲折隐晦的手法，记述陵谷之变，倾泻麦秀之思，体现高蹈远引、不甘屈膝的逸怀清操。可见宋词以空前掩后的成就为两宋文化展现了一幅绚烂多彩的景观。

二、宋型文化的特点

宋代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土壤和时代条件下发展演进，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貌和形态。学界在唐宋两代文化宝塔的对比审察中，曾提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对举的说法。对于两代文化的异同点，大家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对一代定型而成熟的文化继续研讨以体认其特色，把握其基点和神髓，对倡扬传统文化的光亮点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两宋文化的重要特点，我们拟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其一，内向性与开放性。哲学思维上，宋代新儒学主张内省，要在自我

心性上下工夫,倡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文学理论上,《沧浪诗话》提出以禅喻诗,“大抵禅道惟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由此宋诗与盛唐诗的宏放博大气象不同,表现视角相对内倾,表现自我、咏唱高情雅趣的篇什有所增多。宋词倾泻自我情惊诣精造微,而描述社会现象的叙事成分相对减弱。凡此种种都是文化思潮内向性的投影。但是所谓“内向”只是相对于盛唐气象而言,决不可由此忽视宋代文化的某些开放性。开放性有多种表现,从参议朝政来说,国初一些有识度的士大夫,敏锐体察到国弱民贫、宴安守成的局面潜伏着时代危机,陆续不断地倡议变革图强。王禹偁即曾向真宗“上疏言五事”,多陈改革政见。柳开向真宗陈奏说:“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①赵宋建国将近四十年,便已提出“新法”之说。此后“庆历新政”、荆公变法,以至南渡后的中兴之论、光复之谋,历朝改易更革的政见和意图接连不断,有宋一代始终荡漾着不墨守成规、不安于凝滞的议政思潮,这是观念开放的体现。从学术风气来讲,随着仁宗朝改革声浪的高扬,经学界掀起“疑古”之风,刘敞著《七经小传》,欧阳修作《毛诗正义》,王安石撰《三经新义》,司马光发表《疑孟》篇,以至后来理学家力破旧注,以己意和义理解经,均是学风上超越旧权威、开辟新蹊径的体现。从文学创作观念来讲,宋代文人反对模拟,强调创新,鼓励立异。文坛盟主欧阳修通过曾巩向王安石传授作文要义说:“欧公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②梅尧臣主张写诗要“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③。苏轼倡导诗画要敢于独创,善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④。张炎赞赏姜夔赋梅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⑤以宋词为例,除传统题材外,词作在表现性爱、艳情、婚嫁等方面,有不少坦露的描写和无顾忌的衷情倾泻。如果说前期词多为风流文士

①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〇。

② 《曾巩集》卷一六《与王介甫第一书》。

③ 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267页。

④ 《苏轼文集》第5册《书吴道子画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2210页。

⑤ 张炎:《词源》卷下,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266页。

咏歌馆伎情、酒楼艳遇,那么随后则出现不少深闺女性抒写幽会欢情、闺闼恋情、刻骨离情之作,还有的以血泪笔墨控诉自身的婚姻悲剧,这无疑是对封建女诫的大胆违离。所以我们在认同宋代文化的内敛倾向的同时,也应体察它的开放性。

其二,多元性与融合性。宋代是文化多元的时代,也是走向融通的时代。从哲学上说,宋代儒、道、释三教并行,互有驳议,又互相渗透。宋初儒学家承传唐代韩柳道统文统之说,以宗经明道为己任,柳开、王禹偁、孙何、欧阳修等都有排佛的言论。而后儒生学道谈禅,僧道写诗习文,文人禅学化、禅家文士化的趋向日益显著。宋真宗曾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识达之士能一贯之。”^①三教汇一是朝野认同的思潮。理学的开山之师周敦颐沿出入释老、反求诸六经的路数建构“太极图说”。二程吸取释、道,融合三家,体察出“天理”为道学的最高范畴。朱熹援释、道入儒,熔铸三家修炼观、宇宙观、认识论的思想因子,完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宋代文学名家大都融通佛老,如苏轼浑化三教,喜爱谈禅,善于将儒、道、禅对待人生磨难的哲理贯通起来,形成一种圆通明达的忧乐观。辛弃疾是志在复国的事业型词人,也同样兼通佛老,咏过充满禅机理趣的诗章。从文学观念上说,当时文学形态有雅俗的对立,文人大都尚雅忌俗。《沧浪诗话》“诗法”条提出“学诗先除五俗”,即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但宋人诗词演化的趋向却是贯通俗雅,以俗为雅,俗雅兼工。因而雅词、俗词并行不悖,诗文题材日常化,语言通俗化,体格多样化,使文学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从文体来说,诗、词、文、赋,各有疆界,技法亦异,它们在两宋分途并驰,却又出现了写作上互相参鉴、交叉吸取、突破窠臼、拓展新境的现象,如“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赋为词”、骈散结合等,有的学者称之为“破体”、“新变”。凡此均可视为宋型文化多元融通的具体展现。

其三,善思辨与重情惊。宋朝政治环境有利于启开言路,发挥议论;政府为控驭文臣武将,特别鼓励台谏议论时政,纠弹官吏,当局甄拔人才专设“能言极谏科”。宋代儒者摆脱汉唐窠臼重新解经,学派分立,思想活跃,传统儒学趋向哲学化,发展了文士的理性思辨。当时士大夫不仅惯于议政、

^① 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四。

议兵、谈学、论文,而且常就宇宙、历史、人生等幽玄的课题进行高层次的思考和探究,提高了思理品味。文人惯于“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①;宋人爱发议论,长于思辨,使各体文学染上了较为普遍的理性色彩。政论文和奏章固然言论滔滔,连记叙散文也多含议论成分。《后山诗话》谓:“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吴讷《文章辨体序》举出范仲淹记严祠,欧阳修记昼锦堂,苏东坡记山房藏书,张文潜记进学斋,朱熹记婺源书阁,都专尚议论,这说明擅长议论是宋文的一般特征。对于以“缘情而绮靡”的诗体来说,宋人也多以之宣发议论。屠隆《文论》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自来诗体并不排斥议论,但“以议论为诗”,以议论入词,却普遍化于宋代,表明宋代文人雅好思辨。钱钟书先生比较唐宋两代诗风,在《谈艺录》中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确乎指明了唐宋诗的分野。但宋代文学重理性,并不排斥其深于情悰,不过其情感抒发偏于沉潜宛曲而已。其实宋词的抒情性特强,真可谓“深情婉至,摹写殆尽”^②。宋诗也不乏情深意浓之作,如晏殊的《寄远》,梅尧臣的《悼亡》、《书哀》,文同的《春闺》,王安石的《寄吴氏女子》,张耒的《赠营妓刘淑女》,朱淑真的《伤别》,类断肠诗。陆游的多篇游沈园之作,或写恋情亲情,或写生离死别,都是十分动情感人、一睹难忘的。宋文中有不少碑传文、亭台记、书札文、随笔、小品,多写自我,见胸臆,显性灵,其抒情功效也是不可低估的。如苏轼的《记游松风亭》、《在儋耳书》,抒写心情襟绪情深意浓,撼动人心。由此可见宋代文化虽重思理,并不轻淡情悰。

三、宋代文化的神髓

以上对宋型文化的一些特点略予简述,为了把握其基本神髓,以下主要从宋型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环节——宋代士风和宋代文学所体现的值得弘扬的精华与亮点予以阐释。我们认为宋代文化最值得注目的精神是做人崇尚风节,作文深于思理。

① 欧阳修:《欧阳修集》卷二《居士集·镇阳读书》。

② 田同之:《西圃词说·词须有寄托》。

宋朝建国后,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庶族地主经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阶层上冲破了门阀等级,寒门士人提高了社会地位。宋代的政策倾向右文抑武,文化比较开放,教育也显示出普及化、平民化的趋向。科举取士限制势家子弟的特权,开放寒门士子进身的通道。“自仁宗命郡县建学……学校之设遍天下。”^①寒门士子应试,经济上给予补助,“自起程以至回乡费,皆给予公家”^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也比唐代有大幅度的增加。这使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文化教育阶层,士人有广阔的途径进入仕途,登上文坛。宋代政权对庶族士人开放的程度超过唐代,名官显宦出身寒门布衣的比例显著增加。宋代舆论政策相对开明,鼓励士大夫敢言极谏。赵匡胤曾诏令群臣:“指陈时政得失,事关急切者,许不时上章,无以触讳为惧。”^③赵匡胤曾在太庙寝殿夹室立碑,其中有一条告诫嗣位天子:“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④其后历朝嗣君遵从“祖宗家法”,大体上保留了比较自由的建言议政的风气。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士大夫文人的自我价值意识、时代责任意识觉醒了,增长了一种修身养气、磨炼人格的道德追求。宋初出现了一批讲究立世风范的政坛文林名家,他们受到世人的仰慕称许,如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范仲淹谓寇准在澶渊之役中,“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⑤。朱熹称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⑥。王十朋《读〈岳阳楼记〉诗》云:“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宋史·忠义传一》序说:“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可见社会土壤的催发、朝野的倡导、名士的垂范使宋代士人重视风节,蔚然成风。宋代士人讲究风操的人格类型多种多样,今举其要

① 《宋史·选举志一》。

②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③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七。

④ 《避暑漫钞》。

⑤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五,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237页。

⑥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者,略予说明。

(一)耿介敢言,不畏权势

宋朝有气节的文化人,常以直言敢谏自励自勉并互相激励。如王禹偁性格刚直,不随俗俯仰,自称:“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①他因立朝忠直受忌被谗,三度被黜,却高吟“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②,故苏轼颂扬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③。有志于改革弊政的范仲淹,因触怒权相吕夷简被贬;余靖上疏论救亦被贬;尹洙接着上疏要求与范仲淹同贬,亦遭斥逐;高若讷身为谏官,却打顺风旗,欧阳修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又被贬斥;蔡襄公愤然写作《四贤一不肖诗》,轰动一时,“都人士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④宋人以直言相砥砺,于此可见一斑。再如南宋胡铨于绍兴年间写《戊午上高宗封事》,反对朝廷忍辱求和,请斩主降派王伦、秦桧、孙近三人以谢天下,受到秦桧的迫害,被发配到边疆。胡铨不畏强权,写《好事近》(富贵本无心)词,斥骂当时官场“有豺狼当辙”!当胡铨被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时,一些人“畏罪钳舌,莫敢与立谈”,而张元幹则作《贺新郎》为之饯行,张元幹也因此获罪。^⑤叶申芑《本事词》赞张元幹并其词作“刚风劲节,人所共仰”。可知两宋正派人士很敬佩刚直风操。

(二)有志力学,无心致富

宋代看重文治,鼓励力学。宋代学校普及。《宋史·职官志七》载:“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苏轼《南安军学记》说:“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宋代印刷术发展,文化典籍传播较广,官方、私人刻书藏书的风气兴盛,“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⑥,这为寒素之家的士人重文业轻财富提供了方便。范仲淹成名后写给家乡的诗,提醒父老乡亲:“乡人莫相羨,教子读

① 王禹偁:《谪居感事》诗,见王延梯编《王禹偁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46页。

② 王禹偁:《三黜赋》,见王延梯编《王禹偁诗文选》,第256页。

③ 苏轼:《王元之画像赞》。

④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

⑤ 岳珂:《桎史》。

⑥ 《苏轼文集》第2册《李氏山房藏书记》,第359页。

诗书。”^①欧阳修少年孤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为读书“苦志探颐，至忘寝食”。^②刘恕(字道原)笃好史学，读书成癖。《宋史·刘恕传》言：“恕好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他听说宋次道家藏书甚多，便专程前往借阅，次道具餐饌招待，他坚持谢绝，“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他家境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袄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刘恕为人深受苏轼称赏，苏轼的《送刘道原归颍南康诗》赞扬他说：“青衫白发不自叹，富贵在天那得忙。十年闭户乐幽独，百金购书收散亡。”^③陈师道(字无己)“少而好学苦志，年十六，早以文谒曾巩”，受到曾巩的称赏和奖掖。他游学京都洛阳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傅尧俞想结识他，“知其贫，怀金欲为馈，比至，听其论议，益敬畏不敢出”^④。黄庭坚敬佩其为人，在《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诗中称扬他说：“陈侯大雅姿，四壁不治第。……薄饭不能羹，墙阴老春荠。惟有文字工，万古抱根柢。”足见倡导读书风，鄙夷铜臭气，一时在宋代文人中形成风气。黄庭坚《题胡逸老致虚庵》诗，劈头比较藏书和积金的利弊曰：“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常作灾。”^⑤又在《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中咏有“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之句。这种重视文化素养的志趣，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三) 洁身自持，浮云富贵

赵宋统一之初，政治稳定，经济复兴，社会呈向上发展的形势。不少知识分子当时怀有匡翼明时、建功立业的使命感。随后皇室大臣振兴国威、抗御强敌的决心日减，政治弊端日深，加上改革举措受阻，朝内党争剧烈，政治风云变幻，世俗争权逐利，世风渐趋衰落。苏轼在《赠陈守道》诗中曾入木三分地针砭道：“共见利欲饮食事，各有爪牙头角争。”“人伪相加有余

①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七。

② 《宋史·欧阳修传》。

③ 《苏轼诗集》卷六。

④ 《宋史·陈师道传》。

⑤ 刘乃昌：《宋诗三百首评注》，齐鲁书社2004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136页。